

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问题探析

朱 绍 祖 吴 寰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随着清代商品贸易的日渐兴盛,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药材贸易中心。在特殊的“移民社会”环境中,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缺乏内生性,而是以外部力量作为驱动。大体而言,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呈现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地理位置优势为条件、外来人口为驱动、官方政策引导为保障的特点。然而,重庆药材市场的兴起除了传统自发性因素如物产、交通以及人口等方面的参与外,官方的引导和管理也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把药材市场的形成放在特定的区域社会讨论时,就不单单要关注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理性,还应当充分发掘区域社会自身的特点以及能动性等因素。

关键词: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移民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5-0078-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509

药材市场的形成问题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专业性药材市场出现在唐宋时期的西南蜀地^[1],然而到传统社会晚期,该地区的药材市场状况究竟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则少有研究者予以论述。实际上,明清之际,西南地区因遭受战乱的摧残而出现严重的断裂,其经济与社会经历了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重庆由于具备多方面的优势而在商品贸易中逐渐崛起,药材贸易的兴起和药材市场的形成,正是重庆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试图将清代重庆纳入易代之后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中,透过药材这类商品贸易的研究,回答究竟是哪些因素作用于清代重庆的药材市场,借此来窥测西部内陆地区商业城市兴起的特点以及内在逻辑,为区域性药材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模式提供更加生动的案例。

一、外来人口的进入和水上交通的开拓

明清之际,四川地区作为大西军的主要活动地,以及清军与抗清力量交战时间最久的地区,遭受到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朱绍祖(1990—),男,河南宝丰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

吴 寰(1993—),女,重庆奉节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研究”(2019BS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商人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4ZDB035)。

前所未有的生产破坏和人口损失,战乱造成生产凋敝和经济残破。长江上游的商品贸易趋于断绝,各钞关亦相继关闭。康熙初年,扼守长江上下游贸易咽喉的夔关,年收关税银仅一千两。究其原因,“盖以蜀产销灭殆尽,货物不行”^[2]卷67,食货志六·榷政,即便是在西南地区平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地区的人口数量仍然极为有限。地处川东的重庆,“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3]卷10,贡赋。因此,不断提高人口数量,重建地方的经济与社会秩序,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人口的多寡往往被视为国家盛衰和社会治乱的一项重要指标,故历代统治者大都采取了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通过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人口,来保障国家统治的正常秩序。尽管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但是其极为重视因地制宜的治理和经营。鉴于长江上游遭受的严重破坏,官方采取了鼓励性的移民政策,以增益当地的土地和人口。康熙七年(1668),户部题准“四川招民垦荒,准予议叙”^[4]卷166,户部·田赋·开垦一,对于招民入川的官绅给予记功升级的优惠。到康熙十年(1671),为了解决移民的后顾之忧,将流动性的人口转化为固定人口,清廷下令“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4]卷158,户部·户口·流离异地。此外,官方还采取了招徕商贾,活跃蜀地经济的举措,受官方政策的引导,“四方担负而至,蜀渐复故”^[5]卷12,四川布政使巨鹿杨公犹龙墓志铭。民间社会也有传闻:“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6]卷66,雍正六年二月甲辰,这对于生活困顿、举目无望的民众极具蛊惑性和吸引力。

作为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重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是湖广、江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移民的最大落脚点^[7]83。据巴县档案描述说:“渝城遭乱之后,人民稀少。渐有各省人民来此商贸,日久寄居。”^[8]由于重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与前期垦殖性的移民有所不同,后来者大多没有稳定的产业和可供开垦的土地,故他们大多倾向于通过工商业活动来谋求生计。故而,乾隆《巴县志》指出:“各省流寓诸民原无恒产,不能禁其不逐末营。”^[9]卷10,风土志·习俗

在外来人口当中,江西移民是推动重庆药材贸易和药材市场形成的先行者。江西籍移民素以经商见长,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恒徒步数千里,吴、粤、滇、黔、楚、蜀,无不至焉”^[10]卷2,疆域志·风俗。为了扩大市场、控制药源,以谋取更大的利润。康熙时期,自开辟了汉口商业市场后,江西商人又将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作为新的重心,“该帮因见渝中尚无行店,乃首先发动,来渝设立药行”。他们把自己在原籍擅长的药材经营带到重庆,使得药业经营成为重庆商业市场上一个颇具特色的行业。“渝市自有临帮药行后,川中药材业,日渐发达。继而怀帮、浙帮、广帮、汉口帮等,先后来川开设药行,自此以后,药材既能直接办运至其他商埠,汉口销市,便即冷落。”^[11]4,76由此可见,特殊的“移民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商业性移民的进入,不仅有助于整合重庆的商业市场和贸易环境,而且进一步沟通了区域内的商贸联系,推动了重庆药材贸易的兴起。

其实,除了外来人口的进入外,水运交通是实现药材等商品空间转移的必要条件,各地区不同类型商品的贸易和流通需要交通网络的强有力支持。王笛指出,清代长江上游的商品经济与商品贸易之所以有很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有重大突破,与移民对长江上游的开发密不可分^[12]189。事实上,在开发土地和整合商业市场之外,外来移民还有效地适应了国家对西南地区政治经营以及铜铅等矿产资源的开发需要,通过与官方力量的合作,加速了长江上游水路交通的开拓进程。乾隆初期,受“滇铜京运”急迫压力的影响,云南总督公庆复、张允随等积极谋划整治金沙江下游的航道。到乾隆九年(1744),张允随称:“查金沙江,自古不通舟楫,自乾隆七年,上游开通,川楚商船,赴金沙江以上地方贸易者渐多。”^[13]卷225,乾隆九年九月癸卯。尽管金沙江航道的重新开通,原本是为解决京师铸钱铜料短缺的交通运输问题,但是客观上也为包括药材在内的其他各类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方便,促进了沿江商业贸易的发展^[14]。

随着水上交通运输的开辟,长江上游地区干流及其支流之间的内部联系不断加强,许多地区都同重庆建立起了直接的商贸联系。“重庆当二江合流,有舟航转运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会必于重庆。”^{[15]卷12,商业}彭山县的双江镇是岷江主要的水运集散码头之一,“岷山诸水至此合注,直下嘉、渝,来往商旅泊舟憩息,每日约有数百艘”^{[16]卷1,关隘志·镇}。金堂县的赵镇是沱江航线的起点,“上通德、绵、崇、郫,而下达资、富、泸、渝”^[17]。甘肃的碧口镇位嘉陵江之支流白龙江上,到乾隆时期,其水运事业也得到开发,“民船大水时可直通重庆,为川甘间一大转运市,货物以药材为大宗”^[18]。长江上游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构成了连接货物产地与市场的纽带,各地药材正是经由嘉陵江、沱江、岷江等长江支流的商业市镇顺流而下汇集重庆。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长江上游航运开辟以后,大江大河之上从事水上运输的人口不断增长,以船户和水手为突出代表,其存在和发展为药材的大规模、远距离运输提供了重要保障。乾嘉时期,严如煜估计,外省仅在“大江拉把手”者,“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19]卷9,民食}。重庆凭借“三江总汇,水陆冲衢”的优越地理位置,更是吸引了大批的船户和水手,“沿江上下数千里无业者募充水手,大艘四五十人,小亦不下二三十人,……计一岁不止亿万人养活其间也”^{[9]卷3,赋役志·盐法}。

据邱澎生的研究,清代重庆作为一座“河港移民型城市”,从事水上生计的外来移民人数不断增多,至到嘉庆八年(1803),部分船户和水手已经专门组建了大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等经营航运的船帮组织^{[20]376}。他们以此来划定各自的运输范围和运输费用标准,药材即是船帮组织运输的大宗物品之一。据嘉庆九年《八省局绅公议大河船帮差务条规》载:嘉定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2分;叙府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2分;金堂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3分;泸富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2分;合江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1分5厘;江津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1分;长宁帮,杂货药材每件收银1分5厘^[21]。

许多药材经营者就是借助于船帮组织,不断扩大重庆商业市场的药材来源范围,使得药材的跨地区流动更加普遍,这在巴县档案中有较为深刻的反映。乾隆四十七年(1782),商贩杨东来声称:“蚁在叙府贸易,买姜黄二万五千斤来渝发卖,前月二十日抵渝,投王芳兰行内发卖。”^{[22]270}道光时期,经营船业生理的张起也报告说:“小的驾船生理,本月十八日小的在叙府揽载各号客药材、钱包、客铅等项运渝。”^{[23]256}足见在船帮组织和药材商人的作用下,重庆的药材运销范围甚至拓展到了川滇交界的宜宾地区。

总之,在外来人口当中,尤其是商业性移民以及活跃在长江上游的各类船帮组织的影响下,在很大程度上沟通了上游地区内部之间的联系。他们不仅承担起了长江上游社会各类货物的运输角色,而且加速了商贸活动的兴起和商品运销网络的构建。既推动着药材等商品的长途运输和贸易,也为重庆的商业市场提供了广泛的货源,逐渐成为当地药材贸易的有力支撑。

二、药材资源的开发和运销网络的形成

马克思指出:“每一种商品都必定要投入市场,但是,与零售商业不同,真正形成大市场的,只有大量的消费品或者还有作为工业原料的产品。”^{[24]240}特有商品的生产是实现交换和推动市场形成的必要物质基础。药材既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药用功效,也是多类工业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其价值不言而喻。四川和重庆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药材产区之一,素来享有“百药灌丛”的美誉。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天下有九福……蜀川药福”^{[25]卷1,人事门·九福}的说法。尽管四川地区长期以来受山川、河流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属于相对封闭地带,但正是由于当地特殊的环境,孕育了特色鲜明、种类丰富的药材资源。据近人估

计,四川药材“约在二千种左右,按贸易情况而言主要之出口土药,共有六十四种”^{[26]N1}。在国内外消费品市场上,四川药材久负盛名,常与广东药材并肩,称为“川广药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

(一) 野生药材的开发和药材的专业化种植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口数量大幅增长,民众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不断提高^[27]。晚清时,西方人士曾注意到:“中国虽极小市面,必有药铺。消场既广,而川省药材遂为出口之大宗。”^[28]中国内部庞大的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刺激了长江上游的药材生产。在外来人口以及当地民众的开发下,即便是边远地方的野生药材也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和利用。大巴山深处的城口盛产厚朴等药材,“相传乾隆间老林未辟,山中野朴树大如围,皮厚数寸,人家往往以之盖屋。嘉庆后始知厚朴之可贵。”^{[29]卷18,物产志}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小凉山区,当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加入野生药材的采集活动中,“夷地出产药材,如贝母、黄连、附子、厚朴、麝香,并包谷杂粮之类,入汉地,俱换布匹、烟、盐、针线并绸绫、綌緞等件。”^{[30]卷6,夷俗}

除了普通民众和少数民族对药材资源的开发外,外来商贾更是推动重庆及四川药材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秀山的八面山以盛产杜仲、黄柏等药材而著名,“八面山产杜仲至万斤,土氓莫知,有吴贾行山下,见樵以斧斯木,而恶其绵,佯言此恶木。问所生处,则簇根弥崖,因以四万买山,获利百倍。”^{[31]卷12,货殖志}商人收购市场的存在使得此地不是药材的物品变为彼地必需的商品。在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商人及商业资本不仅控制着商品的销售,而且还渗透到生产领域,“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黄)连,一厂辄数十家。大抵山愈高谷愈深,则所产更好。”^{[19]卷9,山货}由此可见,在商人活动和商业资本的双重影响和作用下,四川及重庆的许多药材价值不断被认识和运用,成为流通市场上的商品,这极大地刺激了药材生产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要维持大规模的药材贸易和药材市场,稳定的商品来源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野生药材不需要人工培育及施肥等成本,但野生药材出产不稳定,且采集野生药材所费搜寻的人工和时间,或许比培养的工夫还要多。然而,四川地区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兼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的特征,本身适于药材的种植,“川产若干药材,颇宜于人工培植,如绵阳之麦冬,中江之白芍、中坝之天雄、灌县崇庆之川芎,均颇著名。”^{[32]36}因此,除了野生药材的采集外,民间药材种植颇为兴盛。

在药材的种植过程中,江油的附子、石柱的黄连、绵阳的麦冬等,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而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附子作为四川重要的特产药材,早在宋代其栽培已有相当规模。到清中期,围绕附子的培育、种植和贸易,出现了新的专业性地域分工。“附子种出平武,殖在彰明,贸于江油之中坝场,岁五月间收。”^{[33]卷3,食货志·物产}石柱的黄连等药材生产规模也相当庞大,逐渐形成了一些专业化种植产区。“黄连为厅境大利藪,产黄水坝、双河口等处”^{[34]不分卷,格致},乾隆时期“估客往来,络绎不绝,然皆土人所畜。历三五岁出地,至数岁者为久,贩之四方。土参形似党参,居民亦种售药贾。”^{[35]不分卷,物产志}红花,“乾隆丁酉冬,间有种者,次年花开出售,每百斤得值万八千文,花商贩渝,获息加倍有半。”^{[36]卷9,物产志}这些地区生产的药材大多经由商贩之手,运至重庆销售,获利相当丰厚。

以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多对野生药材较为追捧,比较强调道地药材的使用。然而,随着药材种植的日益普遍化,人们对野生药材和人工种植药材的药效认识产生了重要变化。以麦冬和厚朴两味药材为例,李时珍《本草纲目》载:“麦门冬,古人惟用野生者,后世所用多是种蒔而成。”^{[37]卷16,草部·麦门冬}到乾隆年间,绵阳人从浙江引进优质麦冬品种大量种植,以致“绵州城内外皆产”^{[38]卷51,物产},“由涪江运往渝、申”^[32]。石柱除了出产黄连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厚朴。然而,受消费需求的影响,野生厚朴也基本

上为人工种植所取代,“近年以来,价甚昂,斧斤几无遗种,土人栽植灌溉,数岁可为药材,虽不及先年之厚朴,然用以入药,性固无殊耳。”^[36]卷9,物产志由此可见,在时人的观念中并不认为人工种植的药材就比天然的野生药材药效差。这反而进一步加快了民间药材种植的步伐,形成了持续而稳定的货源。

其实,除了广大产药区的药材开发外,重庆及周边地区本身也具有相当丰富的药材资源,构成了当地药材贸易和市场形成的基础。除了前述的石柱外,涪陵、綦江、江津等地,都是药材品种繁多、产地较为集中、生产规模庞大的产药名区。受重庆商业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些地方的很多药材广泛参与到商业贸易之中。涪陵,“药品,本土所不产者,购自重庆药材行。其有舟载沿江洒卖者名边江,名目繁多,不胜枚举。”^[39]卷18,食货志綦江以盛产枳壳闻名,其种在明代由江西官员引入,最初价低物贱,“乾隆中忽昂贵,遂获厚利以致富,人多植之”,“小贩收买,商人捆包,船载渝行,或径至楚”^[40]卷10,物产。江津不仅出产枳壳,还有枳实、青皮、陈皮、木瓜等多味药材,大都“由水道运出本境,在重庆府发转各省销行”^[41]卷4,物产。

可以说,药材资源的深入开发以及药材的专业化种植,为药材运销网络以及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 药材运销网络的形成

药材运销网络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区域内大大小小的各级市场的参与。自从长江上游地区的交通开辟后,受区域经济开发与商人贸易活动的影响,四川地区的商品交易日益频繁,基层市场数量随之大量增长。据高王凌的估计,乾嘉时期四川大约有三千多个场,一个遍及各地、具有相当规模和活动能力的场市网已在四川盆地形成^[42]79。

很多基层场市在土特产品的收集以及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互通有无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城口“百工匠艺,多别省、别邑之人,商贾亦多外来,以棉花、布帛、杂货于场市,与四乡居民赶集交易,复贩买药材、茶叶、香菇、木耳、椒、蜜、猪、牛等物,往各省发卖”^[29]卷6,风俗志。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双向互动式贸易,外来商人从外地运来棉布、杂货等生活必需品,将其出售给当地民众的同时,又借助于当地业已形成的基层集场收购药材等土特产品,进一步贩运至更高层级的市场。

事实上,农村基层市场的大量出现不仅构成了商品集散和贸易网络的基础,更是远距离、长途贸易的起点^[43]6。尤其是在药材采集或种植相对集中的地区,往往药商云集,络绎于道,演变成为具有集散性质的药材贸易场镇。嘉庆时期,叙州府的马边,“产货如黄连、贝母、厚朴之类,间有采取,皆背负赶场,与汉人交易,换布匹盐烟之类。”^[30]卷6,夷图灌县的青城山盛产川芎、泻泽等药材,境内的石羊场和中兴场尤以药材为大宗,这两个场的药材都集中到崇庆的圆通场,“清道咸间盛时,城中商货咸仰给。以灌境芎、泻均运至是,舟载赴渝。”^[44]卷10,食货显然,基层市场的形成,为当地药材进入更高层级的流通领域提供了良好平台。

除了基层场市外,受商品贸易繁荣的影响,长江上游地区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中级市场,它们大部分是药材的集中产地或集散地。“四川药材种类极多,驰名遐迩,产地首推中坝,次为合川、灌县、雅安、宜宾等县。”^[45]据蒋君章的研究,四川的药材集散大致分六路:西路以灌县为中心,集中青海一部、川西松潘、理番、茂县、汶县等地的药材;西南路以雅安为中心,集中西康及西藏的大部分药材;南路以宜宾为中心,集中川西南及滇、黔两省的部分药材;北路以江油的中坝镇为中心,集中甘肃南部及川北的药材;中路和东路分别以合川、万县为中心,集中嘉陵江流域及川东南和川东北的药材^[46]81-82这些不同区位的药材集散地大体是与药材的集中产地相对应的,它们承担着沟通产地初级市场以及向重庆高层流通市场输送的角色。

自从不同层级的药材市场和运销网络形成以后,“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遥远的城镇,如成都府、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府、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川及其他重要的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茶,并运回洋货。”^[471548-1549]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已经崛起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主要职能是进行转运贸易,沟通全国各区域市场^[48]。药材是重庆商品市场上大宗输出品之一^[49]。这些层级市场构成了长江上游地区药材外运的网络基础,重庆的药材贸易和药材市场,就是通过此类基层市场以及区域内的中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络来实现的。

其实,不仅仅是四川区域内,重庆的药材市场形成还得益于西南及西北省份的滇、贵、甘、陕等地的药材投入。“云南、甘肃、陕西诸省之药,多办运来川,转道出口,故向列于川药范围之内。”^[11]重庆药材市场因得到四川以及周边省份广大药材产地的支持,才得以不断拓宽销路,积极参与到全国性的药材贸易之中,进而实现资源跨区域的优化配置。川产药材之所以能够在清代的全国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力,除了自身庞大的产量外,还与商业贸易作用下的长江上游区域市场网络建立以及重庆口岸药材市场的大量转输密不可分。

三、牙行的建立与药材市场的形成

以往在讨论商业市场的形成时,大多认为其是自发产生的,却忽视了国家的在场^[50]。实际上,在西南地区特殊的移民社会环境当中,该区域内药材市场的兴起固然离不开物产资源、交通、人口等自发性因素的参与,同时官方的引导和管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清代前期官方实行“通商”^[51]政策,这在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同时,也带动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扩张,其中牙行的建立就是官方实现对地方商业市场控制、规范和管理的有效途径。《清会典》规定:“凡城厢衢市,山场镇集,舟车所臻,货财所聚,择民之良者授之帖,以为牙侩,使辨物平价,以通贸易,而税其帖,曰牙税。”^[52]卷17,户部·杂赋加藤繁在论述清代定期市时也指出:“每一种营业,换句话说,每一种商品都可设牙行,而交易额相当大的商品,如绸缎、药材、米粮、牲口、酒、茶等尤有设牙行之必要。”^[53]

然而,掌有牙帖才是牙行设立的先决性条件。在中国传统社会,牙帖数额的多寡,通常意味着获得开展商业贸易,以及扩大市场规模机会的多少。鉴于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与川省其他地区相比该地享有众多的行帖颁发权。乾隆《巴县志》载:“巴为泉货藪,商贾丛集,行帖 150 有余,十倍他邑,向仰给于县官,今咨名于计部。”^[9]卷3,赋役志·课税根据统计显示,雍正二年(1724),巴县牙帖总数共计 152 张,其中山货帖 55 张,广货帖 20 张,杂粮帖 12 张,药材帖 8 张。^[9]卷3,赋役志·课税到嘉庆六年(1801),山货行 38 张、棉花行 12 张、药材行 11 张、靛青 8 张^[21]。尽管与山货、广货相比,药材行帖的数量极为有限,但是仅从行帖的行业布局来看,从雍正到嘉庆的七十余年间,药材已经占据重庆行帖数额的第三位,显示了药材行业在重庆商业市场上的重要影响力。

受中央政令的影响,重庆药材牙行的开设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必先请帖咨部立案,遵照定章开贸。如未请帖者,必租歇业之帖。每家每年认帖租银三四十两不等。请帖后豫佃房屋,宽敞可容各山货药材,或新修房宇,此行帮所以开张最不易也。开张之后,各商自向某行投止,行户代上税厘。即将某货起店过秤,囤放载簿,供商服食一切,至卖货时结销,历有行规,甚便。”^[54]卷23,商业重庆的牙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小规模、集中、易于监管的中介贸易体系^[55]。官方正是凭借对行帖和行户的控制,将重庆的药材贸易和商业市场纳入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之中。

尽管重庆商业市场相比四川其他府县获准的牙帖数额多,但是受清代前期移民活动的影响,有相当

部分的牙行承充者是外来民众。巴县档案中嘉庆六年(1801)的一份调查表明,江西在巴县开行者40户,湖广开行者43户,福建开行者11户,江南开行者5户,陕西开行者6户,广东2户,保定府2户^[21]。显而易见,外来人口在为重庆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几乎支配了整个城市的商业活动,因此重庆最初的药材贸易,主要是由外来客商进行垄断。

除了前述江西商人在重庆药材市场的开拓外,浙江商人也是重要的先行者。与四川、江西等地区相比,浙江本身也是重要的药材出产区,道地药材众多,以“浙八味”最为著名,“以故药商之列肆而居,如游五都之市”^[56]卷11,赵存洵《重修药皇庙记》。浙江商人在四川地区的药材贸易相当活跃,“甬属七邑人士之入川,历史悠久,明清二代,舟楫不绝,而尤以康熙乾嘉之时,采购药材,络绎道路,分庄遍设川康一带,而以渝市为集中地。”^[57]浙江慈溪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58]卷55,前事·风俗 乾隆时期,慈溪人秦学圃“纠约同志,于重庆置敦义庄”^[59]卷27,学圃秦先生八十寿序,作为同乡病亡商人棺木的寄放场所。江西、浙江等外来商人对四川及重庆的开拓,使得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药材贸易联系更加频繁,整个长江流域逐渐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市场的建立和维护当中,地方官府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重庆府巴县官员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巴县衙门曾专门发布告示:“凡城内外各牙行,既有山货广货之分,即宜共循向例,勿许搀越截卖,致启争端。”^[21]为了维护各行相应的经营范围,官方甚至规定了重庆城牙行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地点,“渝城额设牙行,向有开贸处所,例载不准移地把持等因”^[21]。尽管“不许移地开设”的规定,本意是为了减少商业经营者不必要的争端发生,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深刻影响到各类商品的贸易场所和空间布局,甚至推动着重庆药材贸易和商业市场的形成。

自清代重庆药材贸易兴起以后,从节省交易成本和缩短流通时间的角度考虑,药材牙行集中分布在储奇门及太平门一带。由于重庆所开九门的城门外均建有码头,“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储奇门作为重庆城“九开门”之一,“为药帮货物起卸之地”^[15]卷18,市政·码头。如川北的药材集散地中江,其药材运销就是以水运为主,“水运由凯江上木船运往三台,顺涪江经合川,转重庆,在储奇门上岸。”^[60]⁹⁴到清末时,重庆城内的药材“商号荟萃于金紫、储奇、太平三门,及联陞米花小樑子各街段,计有字号一百余家,行店八十余家,铺户一百余家。营业大者百万,次者数十万,小者亦数万。”^[61]这一盛况的出现显然是由前期奠定的。《重庆歌》民谣曰:“储奇门,药材帮,医治百病。”储奇门附近成为药材行帮的聚集重地,这既是重庆药材市场及其专业化商业区形成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时也是官方统一规划和指引之下的结果,表明了重庆药材市场的稳定和成熟。

然而,在“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环境当中,重庆城内充满了复杂性与变动性。即便官方牙行设立的主旨并非是“便商”,但是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也不得不做出“便商”的举动^[55]。毫无疑问,重庆药材牙行的创立,一定程度上确实为各地客商的药材贸易提供了巨大方便。“初无药行之时,出口仅三十四种,二百年前,药行创立,种类及数量乃随之与日俱增。”^[62]与此同时,重庆城内聚集了来自各省的移民和客商,他们建立起了八省会馆,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扩大了商品的贸易网络^[63]。由此,长江上游地区由相对封闭边缘的区域,逐渐纳入覆盖范围广阔的全国性商业市场网络之中,成为全国性药材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余论

本文虽以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作为探究对象,但更多的是尝试把药材市场的形成放在特定的

区域社会内进行讨论。同其他区域药材市场的形成相比,西北地区三原药材市场的形成和官方贸易主导下的市场体系建立相关^[64];江南地区苏州、杭州等药材市场主要得益于自身庞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文化^[65];华北地区安国、百泉、禹州等药材市场大多与民间信仰和庙会活动密不可分^[66]。这表明虽然同样是作为药材市场,各个区域之间药材市场的形成和依赖的路径不尽相同,重庆也不例外。

实际上,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深深扎根于当地特殊的环境之中。明清易代之时,受空前人口损失和经济创伤的影响,重庆商业市场的形成缺乏内生性,呈现出外部因素驱动的特点。在恢复社会经济之初,官方力量的介入往往最为直接和有效。商业性移民的进入以及各类船帮组织的建立,推动着上游地区药材的开发和商贸路线的开辟,为重庆药材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货源。然而,在充满复杂性与变动性的“移民社会”中,官方制度安排下的药材牙行建立,不仅深刻影响了重庆药材贸易的场所和空间布局,也为各地客商的药材贸易提供规范和管理。重庆药材市场集中分布在储奇门附近,不单单是商人自发性的结果,更与官方的规范、管理和布局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呈现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地理位置优势为条件、外来人口为驱动、官方政策引导为保障的特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药材资源,固然构成了重庆药材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但是外来人口的驱动和官方的政策引导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与茶叶、食盐等国家专卖垄断商品相比,药材的生产、运销较少受到国家因素的控制,而对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稳定而丰富的货源,以及便利的交通等因素依赖较高,从中更加容易看到市场自身的动力。但是,当把药材市场的形成问题放在特定的区域社会内进行讨论时,就不仅仅要关注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理性,还应当充分挖掘市场形成背后的系列因素,尤其是从当地特殊的“移民社会”背景以及官方力量的介入等方面予以考虑。

[参 考 文 献]

- [1] 许凯翔. 唐宋时期蜀地的庙市[D]. 台湾新竹: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7.
- [2] 常明,等,修. 杨芳灿,谭光祐,等,纂. 四川通志[M]. 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 [3] 蔡毓荣,修. 龚懋熙,纂. 四川总志[M].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4] 户部·田赋·开垦一[M]//大清会典事例:卷 166.
- [5] 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选[M]. 四库全书本.
- [6] 清世宗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 孙晓芬. 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 [8] 光绪廿四年八省首事汤廷玉等稟请辞职卷[A]. 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案编号:6-33-04611.
- [9] 王尔鉴,修. 王世沿,等,纂. 巴县志[M]. 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 [10] 潘懿,修. 朱孙诒,纂. 清江县志[M]. 清同治九年刊本.
- [11]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编. 四川省之药材[M].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4.
- [12] 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3] 清高宗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张莉红. 长江上游航道的开拓与清代四川沿江贸易的发展[J]. 天府新论,1994(6).
- [15] 朱之洪,等,修. 向楚,等,纂. 巴县志[M]. 民国三十二年刻本.
- [16] 史钦义,等,纂修. 彭山县志[M]. 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 [17] 金堂经济概况[J]. 四川经济季刊,1945(4).
- [18] 李旭旦. 西北科学考察纪略[J]. 地理学报,1942(9).

- [19]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M]. 清道光二年刊本.
- [20] 邱澎生. 国法与帮规: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M]//载邱澎生,陈熙远. 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21]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 清代乾书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G].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 [22] 四川省档案馆,编. 巴县档案汇编·乾隆朝[G].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 [23]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G].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 [24]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0月—1858年5月)[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5] 陶谷. 清异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6] 张肖梅. 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 [27] 狄鸿旭. 清代基层社会的医疗资源探析——以清前期的华北为中心[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28] 时事新闻:四川关务(译伦敦中国报)[J]. 格致新报,1898(14).
- [29] 刘绍文,修. 洪锡畴,纂. 城口厅志[M].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 [30] 周斯才,等,纂修. 马边厅志略[M]. 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 [31] 王寿松,修. 李稽勋,等,纂. 秀山县志[M].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 [32] 周开广. 四川经济志[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 [33] 邓存詠,等,纂修. 龙安府志[M]. 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 [34] 杨应玘,谭永泰,刘青云,编. 石柱厅乡土志[M]. 清抄本.
- [35] 王紫绪,纂修. 石柱厅志[M].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 [36] 王槐龄,纂修. 补辑石柱厅新志[M]. 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 [37]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 [38] 俞廷樟,李在文,范绍泗. 直隶绵州志[M]. 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 [39] 施纪云,纂. 王监清,修.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M]. 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 [40] 宋灏,修. 罗星,纂. 杨铭,续修. 伍浚祥,续纂. 綦江县志[M]. 清同治二年刻本.
- [41] 佚名. 江津县乡土志[M]. 清光绪末抄本.
- [42] 高王凌. 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 清史研究集:第3辑[G].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43] 施坚雅,著. 史建云,徐秀丽,译. 中国农村市场市场和社会结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4] 谢汝霖,等,修. 罗元黼,纂. 崇庆县志[M]. 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 [45] 交通部邮政总局,编. 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四川编·概说[M]. 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
- [46] 蒋君章. 西南经济地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 [47]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8] 许檀. 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J]. 清史研究,1998(3).
- [49] 周琳. 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商品市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 [50] 黄国信. 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51] 张明富.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J]. 古代文明,2016(4).
- [52] 允禔,等,纂. 钦定大清会典[M]. 清光绪十九年石印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3.
- [53] 加藤繁,著. 王兴瑞,译. 清代村镇的定期市[J]. 食货,1937(1).
- [54] 郑贤书,修. 张森楷,纂. 新修合川县志[M]. 民国十年刻本.
- [55] 周琳. “便商”抑或“害商”——从中介贸易纠纷看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的“官牙制”[J]. 新史学,2013(1).
- [56] 戴枚,修. 董沛,等,纂. 鄞县志[M]. 清同治十三年稿本.
- [57] 马积祚. 宁波旅渝之工商界[J]. 宁波旅渝同乡会会刊. 1942-12-12.
- [58] 杨泰亨,修. 冯可镛,纂. 慈溪县志[M]. 民国三年刻本.

- [59] 秦祖泽,等,纂修.学圃秦先生八十寿序[M].慈溪秦氏宗谱:卷27.1926.
- [60] 夏文耀.中江的药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中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G],1989.
- [61] 周懋植.二十年来重庆药材商业衰微之概述:附表[J].工商特刊,1933.
- [62] 江昌绪.四川药材之产销概况[J].四川经济月刊,1936(1).
- [63] 梁勇.清代重庆八省会馆[J].历史档案,2011(2).
- [64] 张萍.官方贸易主导下清代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J].清史研究,2016(6).
- [65] 邱仲麟.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9).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66] 赵燊黄,著.樊菊芬,点校.祁州药志[M].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李留文.洪山信仰与明清时期中原药材市场的变迁[J].安徽史学,2017(5).

The Formation Path of Medicine Market in Chongqing in Qing Dynasty

Zhu Shaozu Wu H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ity of commodity trade in Qing Dynasty, Chongqing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trade center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special “immigrant society” environment, the formation of Chongqing herbal medicine market lacks endogeneity, but is driven by external forces. In the Qing Dynasty, medicine market of Chongq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market – oriented and policy driven.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raditional spontaneous factors such as products, transportation and population, the official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market in a specific regional society,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in the general sense, but also ful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and initiative factors.

Keywords: Qing Dynasty; Chongqing; medicinal materials; immigration

[责任编辑:孟西]